

茶座

总第二十辑 2010 第二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孙吉诚：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萨 苏：福冈有座定远馆

王朝光：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二）

赵 晖：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孟祥才：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一）

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李伯重：从“上海小男人”谈清代妇女

聂作平：“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

——位高级官员见证的晚清危局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 | 历史学家茶座20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 20 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09-05320-4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509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重返历史本体

王学典

日前,在《文史哲》杂志举办的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上,冯天瑜先生在发言中断定“五月二日”,即此次论坛的开幕日将会载入学术史,——这一天,除冯先生外,李伯重、汪晖、秦晖、何怀宏、萧功秦、张希清、李治安、王和、荣剑、李振宏、仲伟民、李若晖、张金光、孟祥才等 20 位学者齐聚山东大学,研讨“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冯先生此言实际是暗示:史学界正在发生方向性调整,即史学界正在重返对历史进程本身等宏大问题的关注之中。这种方向性调整当然不是启动于 2010 年 5 月 2 日,而是启动于 2006 年 2 月,也即《“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之时。

近三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逐渐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拷问所代替,譬如,1949 年后的前三十年,史学界热衷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后三十年则热衷于“历史认识论”等问题的讨论。在后三十年期间,史学界对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理论则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一变动自有其学术史意义,但这一变动所导致的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是:在中国史几乎所有局部知识点上,近三十年都有长足的进步,乃至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又陈陈相因,依然是“五种生产方式”,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在人文领域其他学科天翻地覆的同时,历史学却“我自岿然不动”!这不能不说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忽视综合和概括的史学风气的惩罚和报复。

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经济转型,但是三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回答一个与这一转型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这种独特的社会转型之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学术界必须同步奠定这一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尽快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史学界实在没有理由再蹉跎!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重返历史本体

历史现场

- 007 孙言诚 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017 萨 苏 福冈有座定远馆
026 伊丽莎白·海靖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二)——慈禧接见外国驻华公使夫人

重读民国史

- 034 汪朝光 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二)
039 赵 晖 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学坛述往

- 050 孟祥才 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一)
059 刘 超 旧时的学人与学界(二)——渐行渐远的“大菩萨”

史论沙龙

- 070 杨奎松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人物春秋

- 080 李伯重 从“上海小男人”谈清代妇女
088 魏邦良 江冬秀：“最后的一位‘福人’”
098 王国华 当年曾是同路人——梁实秋和闻一多

公私档案

- 106 聂作平 “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一位高级官员见证的晚清危局
119 黄力民 甲级战犯典型情节与东京审判的解读

旧案重审

- 133 吴振清 何如璋冤案辨析

九州风土

- 139 王振忠 华云会

书林琐记

- 149 张 伟 吴晗谈历史教科书编纂的两件档案史料

掌故钩沉

- 153 散 木 古代官吏读书及其他
157 陈仲丹 男助产士



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孙言诚

一段时间,名人、明星纷纷著书立说,记述自己的婚恋、婚变故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看,自会有人去写。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洪君彦的《不堪回首》,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二人都谈到了历史。章说要“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洪则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读了二位的书,人们不由得对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遭难

章、洪婚变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介入。那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与会者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以翻译身份参加。由于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那天毛泽东异常兴奋,古今中外,谈笑风生。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视章含之,语出惊人:

“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在开玩笑,毛却认真地说: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有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此时的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十年风雨情》）。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连周总理都震惊了，毫无疑问也打动了读者。对那位负心丈夫，人人切齿，对忍辱负重的章女士个个同情。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军国大事尚且一言九鼎，何况这区区离婚。所以，当章含之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时，读者无不人心大快，既为章女士摆脱了婚姻困扰而庆贺，又为伟大领袖的英明睿智、体贴入微而赞叹。

不料，沉默了几十年的负心丈夫，于今爆出新料。原来在“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之前，那男人的女人早“已经同别人好了”。用洪先生的话说，是章含之“红杏出墙”在前，洪君彦“牛棚作乐”在后。说实在的，此类故事所在多有，比明星绯闻逊色多了。但因为章女士把它和伟大领袖联系了起来，故事情节一旦有变，自然就令人惊诧莫名了。

章、洪婚变源于“文革”，故二人都谈到了“文革”中的灾难，这灾难也和大红门内的那个四合院有关。章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避风港也没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文革”中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居然也有“可怕的岁月”。据说，她被揪出来后，“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些回忆,使人止不住对章女士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洪君彦的书却写出了另一个故事:

自从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任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批周”会上的“小人物”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

然而,“批周”却并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士谈话,对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右倾错误”严加申斥:“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亲自拟定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名单,即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小: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章由此成了“批周”会上的“小人物”之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会议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有参加者才会知道。但章含之却说:“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昨日旧事残梦》)被与会高层人士慨叹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会议记录,据说已经付之一炬了,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宁肯让局外人去研究,后人又怎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呢!

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从相关人员的回忆中,感受到会议的紧张、激烈。

一次,警卫战士张树迎进会场送药,见“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目睹现场,“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每天散会后,“(伯伯)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我的伯父周恩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吧!”(《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在会场外,周的警卫、保健大夫也备受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

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彼此目光接触……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同上)。

随员们甚至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我们的直感是……像要动手杀牛了。”(《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别看是政治局会议,左右形势的还是“小人物”。就是调门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领。如她说周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显然是把上次“明灯”的谈话挪了过来,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员还明白,盖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闻生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口衔天条,自然了得。张颖听一位与会者说,周恩来癌症在身,右手发颤,想让一位小人物帮忙记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圆睁,怒斥道:“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外交风云亲历记》)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联络员风光,充其量不过是“偏师借重黄公略”罢了。但章和乔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点。章曾这样剖析:“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叶帅,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用力握一下手;纪登奎则会悄悄地问张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一握手,一句话,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是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也是真刀真枪啊!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据章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

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我也想,周大概不会去说那些工作人员吧!

我很欣赏章书中的一句话:“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没经历过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断然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语言。

四个女人一台戏

章含之说:“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批周”,另外一次则是“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这一搏,章含之称之为“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乔冠华说是“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而毛泽东则说是“借刀杀人”。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政治风浪”是批邓。在外交部批邓时,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王海容发生了矛盾,这矛盾说到底无非是都想把对方的人搞成批判对象。为了对付“通天人物”,章和乔决心投靠江青,通过江青向毛呈递告状信,这就是所谓的“拼命一搏”。章含之说她这是“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意在“保护老干部”,似乎是在抵制批邓,因而她至死也对此“处之泰然”,不以为错。但是要说江青会支持章乔抵制批邓,未免不合情理,所以章在书中说了些云里雾里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

揭开这一谜团,还需从王海容、唐闻生身份的改变说起。“批周”会后,有件事让王、唐大吃一惊。12月9日,即“批周”会结束的第四天,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先是同周“长时间热烈握手”,然后笑着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又指着在座的王、唐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已,也整了我。”(《毛泽东传》)有一本书上说:“毛还叮嘱要把他的话写进记录里去。一个小人物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是否此事起作用,不敢妄测,但从此以后,王、唐和周恩来的确走得越来越近了。在周、邓和江青的斗争中,王、唐可以说是配合默契。当然,这也和毛决心起用邓,有意识地疏远江青有关。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外交部为此打了报告。江青找到王海容,要她收回报告,王坚决拒绝。江又打了几次电话给王,王寸步不让,江气得破口大骂。周恩来让王、唐把政治局会上江青的态度报告给毛泽东,毛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江青讨了个没趣。

10月17日,江青为“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18日王洪文去长沙告状。19日周恩来在医院对王、唐说:“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人事先计划要整小平同志。”20日,王、唐根据周的意见向毛作了汇报,毛很生气,要她俩转告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据纪登奎回忆,总理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

11月12日,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起10月17日会议的事,说:“(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王、唐)都不高兴。”

11月19日,江青要王、唐转告毛泽东,让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听后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主席。”

1975年初,四届人大后,江青把王、唐找去,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了一遍,并要她俩把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她俩问:“你呢?”毛说:“不在她眼里。”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27日晚,周、邓在305医院和王、唐长谈,要王、唐把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事后,毛对邓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你、反总理、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变了。”

据《周恩来年谱》,周在305医院住院期间,共约见中央负责人五十余次,其中约见王、唐就达十余次,有几次还进行了长谈。直到去世前,1975年12月的一天深夜,总理还约见王、唐,面色凝重地对王、唐说:“主席讲‘江青有野心’这句话,你们都听到过的,当时你们在场,你们要做历史的见证人。”王、唐含着热泪默默地退出了病房。(《周恩来临终嘱托:要见证“江青有野心”》)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王、唐一方面和江青结下了梁子,一方面也使毛泽东在下决心批邓(亦即批周)后,无法再使用这两位联络员。1975年10月,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

子’跳船了……”(《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载《问史求信集》。)毛甚至“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可非同一般，他叫江青“妈妈”。深谙高层内幕的章含之，正是在知道这些情况后，才拉着乔“拼命一搏”，跳上了江青这条船。

其实，王、唐虽然失去了联络员身份，但还是要紧跟毛主席批邓的。所以毛希望江、章和王、唐能携起手来共同批邓。接到章的告状信(注意，不是“借刀杀人”那封，章在书中有意把两封信混在一起谈)后的1975年12月12日，毛当着章、乔的面对王、唐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毛的意思很清楚：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可章含之却认为是自己告状成功，于是再接再厉。天安门事件后，1976年4月26日，章含之通过江青又送上一封信，密告王、唐受邓小平指使，传递康生的话，说江青是叛徒。章在信中说，这“矛头是对着主席的”。殊不知，王、唐去见康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所以毛在信上批示：“借刀杀人！”毛远新也在电话上批评乔冠华：“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如此简单明了的事，章含之竟百思不解，说什么：“至今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一出戏。”局外人看了，只会哑然失笑。

实际上，江、章、王、唐倒的确是在“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中，上演了一幕发人深省的大戏。